

香港基督教會的

現況報告

郭乃弘著
林瑞琪譯

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廿六日為耶穌會士在
香港所舉辦的講習會而發表的一篇演講



在每一個時代，基督的教會都在回應環境的需要，極力保持對上主的忠信，更深信上主是在這些環境中行動。

本文是我個人對香港教會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的解釋。並且，本文所指的香港教會亦只限於那些來自非天主教背景的基督教會，而所說的歷史亦是指這些基督教會的歷史。本文把香港教會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開首的一百年（1842—1942）；擴展期（1942—1962）；參與社會發展期（1962—1982）；對未來的探索（1982—2002）。

開首的一百年（1842—1942）

早在一八四二年英國人抵港之前，香港已經是中國漁民聚居了好幾個世紀的地方。但香港成了英國殖民地之後，才開始變得重要，使世界觸目。

回顧十九世紀，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發展至極點，很多西方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發生了興趣，而中國在當時已經是人口最盛的國家。由於自給自足的中國實行閉關自守，故此貪婪和侵略的西方強權遂以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戰事開始，結果是中國被迫開放通商港口，廣闊的中國土地部份淪為租借地，或乾脆割讓了給外國。

大英帝國於一八四〇及一八五〇年代，先後兩次在不名譽的鴉片戰爭中擊敗了中國。由於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了給英國。由於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

，九龍（現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則永久割讓與英國。最後，一八九八年在北京，中國政府又將新界及週圍的一百多個大小島嶼（佔目前全港面積百份之九十二）租借與英國，為期九十九年。

在英國殖民地政府成立之後，商界及西方差會紛紛派人來港。政府當局在香港設立了較有效率的行政機構，特別是在法律及社會秩序方面。中國與西方的鉅額貿易使香港成為日漸重要的轉口港（香港擁有世界最佳的港口之一）。教會既得到政府的支持，因而也輕易地取信於社會，於是在提供主要社會服務方面能發揮助力（特別是在醫療衛生，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方面）。這些年間，教會亦為社會培養出一大批年青才俊，他們日後都成為社會及政府中的骨幹，而肩負這些培育工作的機構，計有英華書院及英華女校（由倫敦差會建立）、拔萃男校及拔萃女校（由倫敦差會及香港聖公會合辦）。

大部份的西方商人及貿易家，以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大陸的踏腳石，而差會的心態亦然。因此，香港開埠初期，成了人所共知的進入中國大陸的「橋頭堡」。

在拓荒期，教會在香港的發展十分緩慢。本地華人教會所關心的，大多是以自己教會內的牧民工作。大型的佈道會十分盛行。海外移來的差會則提供社會服務，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及剛才提及的幾間教育機構，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

華人教會之間的合作在戰前早已發展得很緊密，各宗派常邀請不同教派者，交換講道。為了要合作管理兩塊基督教墓地及一所安老院，一九三〇年代成立了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該會只接受本地華人教會作會員。

擴展期（1942—1962）

戰前香港人的生活節奏十分緩慢。但二次大戰之後，由於忽然間由中國大陸湧入大量移民，政府及教會的服務工作迅速發展起來。

在日本佔據香港之後，（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四五年八月，共三年零八個月），重建香港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大戰剛結束，中國大陸上又發生嚴重的內戰，結果導致共產黨掌政。之後韓戰爆發，美國宣佈封鎖中國大陸及北韓。這對極度倚靠國際貿易，特別是倚賴中美間貿易以維生的香港，影響十分重大。

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從中國大陸湧入的移民會破壞香港。在二次大戰剛結束時，香港人口約有六十萬；而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統計所得的數字，竟高達三百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八。

不過，香港市民憑自己的努力，令專家們跌眼鏡。他們表現出對各種環境的驚人適應力，而且以自己的血汗，換來香港的生存和前景。

無疑，香港非常幸運，它因大量移民湧入而獲得需求甚殷的勞動力；特別是從上海湧入的紡織業資金及技術，它們對香港經濟的成長，實有極顯著的貢獻。這兩項因素，使香港在一夜之間，從一個轉口港變成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稍後，又引進了塑膠業及電子業，而且迅速蓬勃起來。很多輕工業則交由家庭或小型工廠完成。造船業，包括修船及打撈沉船，算是香港當日唯一的重工業。不過，人口激增亦促進了樓宇建築及其

他公共措施的建設，包括道路、天橋，以至填海等工程，因而導致建造業迅速發展，正好為數以千計急需工作的人士提供了職位。

在這期間，究竟教會在香港有什麼發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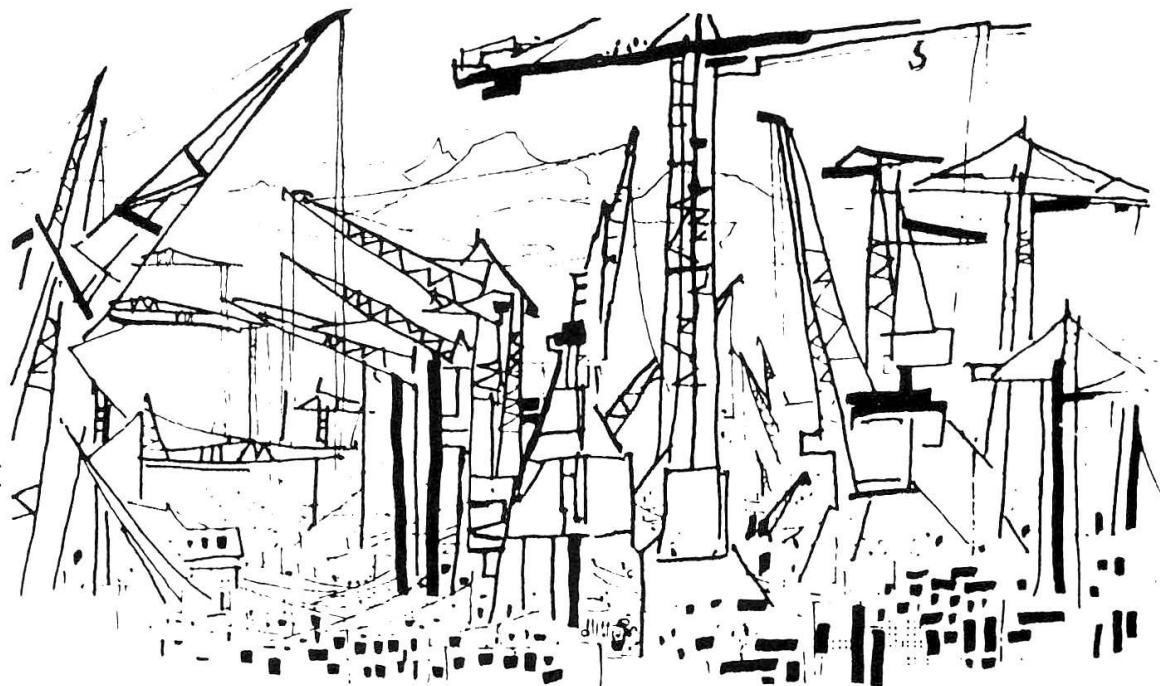
首先，我們會發現基督徒的人數是普遍地大幅度增長。他們加入教會的動機混淆不清：有些人是「麵粉教友」（他們只為物質利益而入教），有些人是從大陸遷徙來港的基督徒（他們大部份屬於中產階級），亦有一些人為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入教。

其次，在五十年代初期，大量資深的傳教士來到本港工作，他們在財政上獲得自己所屬差會的支持。這些經濟資源，對協助政府解決嚴重的難民問題，十分需要。本地教會亦積極為千萬難民提供救濟及服務。大部份社會福利機構是在這期間建立，它們直接或間接獲得海外差會在財政上的支持。

第三，這段時期標誌了教會合一的進步。香港基督教福利及救濟會就是為了統籌各基督徒團體的救濟工作而設立的。為了支持各教會的傳道工作，基督教會又成立了影音視聽委員會。而其間最重要的發展，則是在一九五四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會不但為各教會提供了一個交流場所，更在促進各主流教會肩負共同使命、聯合行動方面發揮極大的作用。此外，協進會每年亦主催合一聚會，包括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世界公禱日及全球性的合一主日。

參與社會發展期（1962—1982）

香港在這段時期內發展迅速。它雖然缺乏土地及原料，却富於人力資源。中國供應了香港所需的大量糧食及食水；政府的法治



和推行自由經濟政策，亦是導致香港成功的因素。早在六十年代，以亞洲的標準來看，香港已是一個富裕的社會，雖然它要努力對抗幾個主要貿易夥伴（如美國及歐洲共同市場）所採取的保護主義政策，又要在七十年代初期克服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但在七十年代末期，香港仍能發展成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在全世界的出口國中，名列第十五位（成衣出口量更居世界之首）。

然而，香港為了經濟發展，也付出很大的代價，就是：忽略了年青的一代。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使政府、社團、以至教會認識到，必須為我們年青一代付出更多的關懷。於是，教會設立了很多青年中心及康樂設施。但發展得最迅速的是在教育方面。在這段期間，香港的年青一代開始可以享有九年免費教育（以前只有六年）。因此，政府只得透過教會的協助，才能提供額外的學額。

也就是在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出，教會再不甘於只幫助政府提供社會上的服務，却逐步負擔起作為社會良知的新角色。

面對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教會深受衝擊。很多牧師及平信徒領袖移居海外。留下來的人必須正視教會工作的切身影響。西方社會傳入的學運及工運成了催化劑，迫使教會突破自己的框框，開始擴闊眼光，關注社會事務。

在對社會的參與上，教會有了很大轉變。由於香港社會日趨繁榮，物資上的直接救濟及福利逐步減少，因而教會可以將其資源指向間接的服務上。其中一個好的例子就是教育，特別是中小學教育；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社會福利。為了應付社會及個人需要的急劇轉變，教會在這二十年間，推出了多項創新的計劃。教會的社會服務日趨專業化，而香港也在多方面可說達至世界水平。

在這段期間，教會越來越注意社會現實生活中向來被忽略的一面。為了解決社會及個人的問題，教會必須對付造成這些問題的結構根源。因此，教會比較以前更積極投身於社會行動。透過設立類似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壓力團體，教會不單鼓吹設立更適當的法例去保護貧苦大眾，呼籲社會進行結構上更徹底的改革，而且發揮教育力量，訓導平信徒去推行社會正義。

由於教會內部急劇轉變，加上俗化主義的嚴重影響，導致歸主的人數下降，主流教會當中，會衆數目的增長十分小。可是，與此同時，很多福音派教會的會衆却有顯著的增加。福音派人士所建立的類似教會的組織，亦發展迅速。

至這段時期之末，主流教會與福音派教會之間的傳統差異再不如以往時明顯。一方面，主流教會開始認識到尋求內修更新的重要性；另一面，福音派人士亦開始更多參與社會事務。（我肯定，一九七四年的瑞士洛桑會議深深影響了香港福音派教會，使她們在態度及關注上，產生了這種改變。）

這個時期的另一特色，就是海外差會的工作人員逐步撤出香港。他們大部份的工作都交由本地教會或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負責。

在合一運動方面，不同背景的教會更懂得為公共事務而合作。位於觀塘工業區的聯合醫院及社區健康計劃是兩個很好的例子。

在這期間，基督教協進會舉辦了兩次全港性的大型諮詢會議，而其中的七十年代香港教會諮詢會議意義尤大。該會議由港督主持開幕禮，會議所針對的主要是教會內部的問題，比如：基督徒的教育、新團體的培育、社會的關注等等。八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亦收穫豐富，與會者包括：協進會內各教會的領袖、多個福音派教會的代表、

以及天主教的代表。這次諮詢會議頗關心世界，正所謂「世界乃會議的議程」。會議上清楚宣佈，教會未來十年的五個主要使命是：(1)向低薪市民傳福音，(2)教會參與公共政策的釐訂，(3)關懷中國大陸的教會，(4)向中學生傳福音，(5)關注市民的心態。

這次諮詢會議帶出兩個直接又明顯的效果：首先是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其次是與在中國大陸的教會重新建立關係。（一九五四年以來中國教會成了三自運動教會之後，國內外教會之間一直沒有正式的聯繫）。

香港天主教與基督教協進會之間的關係是在一九七〇年開始建立，其間成立了教會聯合發展委員會（主要是關注在本港發展的問題）。雙方多次攜手合辦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各項活動，共同推動多個特殊主日（例如：傳播主日、教育主日、航海主日、合一主日等等）。

對未來的探索（1982—2002）

假如我們說香港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二年經歷了一場經濟變革，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經歷了社會變革，則香港現在正面臨一九九七問題，進入一個政治變革的時代。

一九七二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時，她已明確表示了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一九七九年港督訪問中國時，鄧小平告訴他最遲在一九九七年或以前，會收回整個香港的全部主權。（港督返港後並沒有向港人透露這一點，他只轉述鄧小平的說話，請香港人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放心」。）

很明顯，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應中國外交部的邀請前往北京，是為了商談解決香港前途的問題。在她訪問後，經過了十個月，英國才終於明白到英國政府已無選擇的餘地，必須將香港主權歸還中國。正式的談判在一九八三年七月開始，共耗去中英雙方代表團十四個月時間，舉行了二十二輪會談，然後達成協議。其間雙方談判領袖還舉行過多次非正式交談。會談的最後一週成立了工作小組。英國外相賀維亦分別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及七月兩度訪問北京。

兩國政府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草案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簽署。協議草案包括一項聯合聲明及三項附件（第一項附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第二項是「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三項是「關於土地契約」；並附有兩個政府有關國籍及公民權交換的備忘錄）。

根據協議草案，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前途如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中國將收回對香港的主權；除了外交及國防事務外，香港可自行選舉其立法機構，香港的行政架構（可透過選舉或協商而產生）須向這立法機構負責。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香港可以維持其現存的經濟、社會及司法制度，五十年不變，而市民亦可繼續享有目前的生活方式及各種自由。

面對這即將來臨的政治轉變，香港的教會應作出怎樣的回應呢？

首先，在一九八四年初，有些福音派的基督徒領袖發表了一份信念書，申明基督徒信仰在社會劇變中所應堅持的十點信念。這份信念書在基督徒中廣泛流傳，很多基督徒團體還加以細心研究。

隨着信念書的產生，「宗教自由聲明」在夏天出現。我認為這是香港教會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今年較早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覺得需要和中國政府當局談談香港教會目前的工作。因此，這份聲明與其說是一項要求，不如說是一份香港教會現況的全面性描述。它之所以視為一份聲明，乃因它在其引言中聲明：「宗教自由是基於人權。人權乃上帝所賦予，與生俱來，因此，無論任何政府皆有責任加以維護」；以及在其結語中表示，教會願意與香港市民繼續共同奮鬥，合力建設更美好的將來。

大部份基督教組織（差不多二百所堂會及許多其他教會機構）都簽署認同了這份聲明。這聲明經新華社香港分社轉交北京當局，並在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向各界公佈。

八四年九月六日，二十一位教會領袖，包括各宗派及教會機構的首腦；以及本地教

會的牧師，一同赴北京拜會中國政府當局。同樣，訪問團並無意向中國政府當局提出任何要求。我們只是上去交換意見及表達我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表達出什麼需要保留，什麼需要改變。我們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呈交了一份立場書。同時我們希望知道一下中國領導人對「宗教自由」的看法。我們與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我們希望讓他們了解到香港教會的現況。與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會面時，我們留心傾聽。按姬鵬飛先生所言，香港教會的社會服務仍可繼續；中國不會在香港成立宗教事務局辦公室，香港教會亦不會隸屬於中國的三自教會之下。

未來的二十年為香港將是關鍵性的時期。香港會否維持安定及繁榮要看港人的努力而定。我深信中英雙方政府都切願執行香港前途協議。聯合聲明草簽之後，許多國家，包括香港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及日本，都表



香港教會應對現行的思想形態及傳教方針重新深入反省

示支持這份聲明。

面對這種情況，香港的教會又何去何從呢？

第一件事，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我們自己的信仰。假如我們說有很多人對香港的前途缺乏信心，那麼，香港的基督徒又有何態度？目前，一方面，教會應再肯定我們所信仰的上帝是在歷史中行動的上帝，祂統馭一切，我們的前途是在祂的手中；同時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忠於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召喚，去參與祂對世界永不停息的創造、救贖、以及保存的工程。

其次，香港教會應對現行的思想形態及傳教方針重新深入反省。很多牧師及大部份的信友都只顧向內看，基督徒生活與基督徒信仰仍然是互不相干的兩回事。本地堂會只是一幢幢的建築物，讓人有地方從事次文化及社交活動而已。堂會的真正概念對他們來說變得完全陌生，因為本地堂會將自己與自己所身處的社會完全分隔開。

我相信香港教會需要更新。他們必須返本歸源，再次使每一個堂會成為一個懺悔、學習、參與、分享、治療、修好、期待以及團結的團契，務使它的成員反映出真正基督化的生活方式。

過去三十年，教會為香港市民提供了很重要的社會服務，包括專上教育工作。目前，基督教堂會及機構（連同天主教會在內）為本港提供了超過百份之四十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百份之五十的社會服務機構，以及約百份之二十的病床數目。而面對九七問題，教會必須集中力量去參與以下的工作：

（甲）參與草擬基本法：現今我們已經有一份較為健全的基本協議，下一步功夫就是按照這協議制訂基本法，俾能作為治理一

九九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據。為免基本法的起草過程被某些有勢力的利益團體或黨派所壟斷，教會必須挺身而出，為社會上靜默的一群講說話，以確保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能徵詢到各方面的意見。

（乙）民主化：不久將來，香港市民將有機會嘗試由本地人自治。正如代議政制綠皮書中所指出，香港政府計劃，起碼在一九八八年以前，立法局不會進行直接選舉。在這事上，教會必須催促政府。香港市民愈早有機會參與中央政府的工作，愈有利於在九七年前建立一個良好運作的本地政府。

年青一代必須有機會接受政治教育。政治教育不必是學校教育中的附加科目（香港的學生根本已被填塞得太多書本課程）。相反，這可以是課外活動的一部份，比如：參與學生會、校內校外，以及社區的事務等。教會主辦的學校及青年團體應立即負起這項任務。學生亦應學習去區辨個人之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分別。

推廣民主化既是教會的任務之一，則教會亦有必要積極參加選民登記，並鼓勵有潛質的教會領袖競選區議會及市政局等本地公職。

（丙）中國化：十餘年之後，香港就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我們必須明白香港的穩定及繁榮有賴於中國的發展。所以目前是最適當的時刻，我們不但要開始考慮怎樣使香港變得更美好；而且也要考慮到如何為中國的四化作出貢獻。百份之九十八的香港市民是中國人，但我發覺，似乎絕大部份人都與中國文化的根脫了節。香港市民在生活上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接近西方多於仿效中國。所以，協助香港市民重新發現及重視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亦是當前急務之一。香港的年

青人應對中國歷史（包括當代史及中文）有更深刻的認識。教會既藉她們所主辦的學校及青年團體，接觸到大量青年人，則教會實應在這方面多做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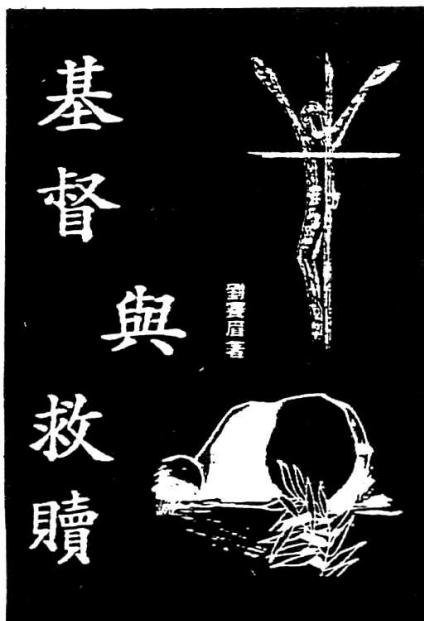
爲了履行上述各項任務，本港各教會應暫時放開神學及教派上的分歧，攜手合作去面對這些共同的挑戰。

目前，在本港有超過六百四十間基督教教堂會，其中一百二十四間是獨立的，其餘則分屬於四十四個教派。這衆多的教會在本港有會衆超過二十二萬，人力物力都十分充裕。只可惜他們大部份人都側重於解決個人未來出路的問題，而未能爲社會整體利益而多盡點力。他們距離「教會是爲整個世界而存

在」的這一事實相去仍遠。

可幸的是，儘管很多青年信友不再對其教會抱有希望，但他們仍決心回應社會上最急切的需要及香港未來的需求。這已在教會內外形成一股巨大的更新力量。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已不斷發展成爲社會行動的焦點。有關的基督徒已在教派及神學的分歧上，肯開放自己，而且他們愈來愈迎向及支持基督教協進會。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亦決心接受這重大的挑戰，願意在這歷史關鍵性的時刻，重新肯定其對香港市民的責任，並決意爲建立一個更公義及更合乎人性的中國和香港而努力。



劉賽眉修女著

基督與救贖

已經出版，
每冊售價港幣二十元正
洽購處：聖神研究中心
香港香港仔惠福道六號
電話：5—530141